



热点聚焦

让优质教育“人人可享 处处可达”

■ 贺祖斌

推进教育数字化，就是为了更好地通过国家搭建的平台将优质教育资源汇聚起来。任何人都能由此在互联网上轻松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从而缩小区域教育差距，更好提升核心素养，最终实现教育公平。

教育数字化资源的需求更加强烈，新的教育模式向互动式、主动式学习转变。欠发达地区要想紧跟或赶上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就是要大力紧跟教育数字化发展趋势，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进一步推进传统课程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创建数字化教育新型学习模式。

赋能终身学习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整体教育资源分布还不均衡，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条件存在较大差距。要更好推进建设学习型社会，推进教育数字化是一条较为便捷、快速的路径，它能使不同区域的人群共享到全国甚至全球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真正促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推进教育数字化实现优质教育普及的现实挑战

教育数字技术面临壁垒。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要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基础，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紧密相连。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回答好如何运用数字技术加快教育范式改变、教育秩序重塑、教育结构变革等命题仍然面临挑战。

教育数字数据存在鸿沟。《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要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长期以来

来，城乡教育在教育理念、设施、师资、机会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面对教育数字化浪潮，很多偏远地区师生对教育数字数据了解极为缺乏，教育数字数据缺乏共享共用共通，这种教育资源的城乡差距极大影响了学生的个人发展，弱化了社会流动，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师生数字素养参差不齐。教育部2023年年初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将“教师数字素养”定义为：教师适当利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管理和评价数字信息和资源，发现、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优化、创新和变革教育教学活动所具有的意识、能力和责任。但是，当前师生对数字素养的核心内涵和基本要求的认识还很不充分，面对海量信息抓取、辨别有用教育信息的能力仍有欠缺，对运用数字技术融入课堂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还不够，对创新开发数字技术、整合教育数字的能力相对缺乏，技能水平不均，师生参与数字素养的培训还有所欠缺。同时，还存在数字伦理意识不强等问题。这些阻碍了教育数字化的发展。

推进教育数字化实现优质教育普及的实践路径

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交汇点”，要勇于承担社会发展使命，

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加快布局建设高水平人工智能学院，真正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孵化、国际合作”于一体的人工智能教科产融合基地。同时，高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联合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实验室，加快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体系，赋能教育数字化迅速发展，更好普及优质教育资源。

加强教育数据治理。要树立“数据也是新质生产力”的理念，强化“数据治理”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举措的观念，加大教育数据的整理和收集，加强数据集成与分析，更好运用到推动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事业中。同时，要强化数据互联互通，特别是强化教育数据与国家人口、空间地理、经济社会、行业产业等数据的互通，建成学校、学生、教师全链条管理信息系统，真正实现“让师生少跑腿，让数据多走路”，构建大数据赋能教育治理新体系。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学校要深入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主动和全面提升师生数字素养。从政府部门角度来说，要从政策、经费、人才保障等方面出台支持举措，给予充分的经费保障，强化数字素养的师资培养和培训，建立大中小学相衔接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从学校来说，要主动开设数字素养相关培训课程，将数字素养纳入师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要深化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将数字素养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加大培训力度，争取教育管理干部、学校管理者数字素养培训全覆盖，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育数字化管理和技术支持队伍，更好赋能教育数字化，让优质教育真正“人人可享、处处可达”。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无底线「关税讹诈」暴露了哪些逻辑谬误

■ 董小鹏

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完全是在扭曲公平贸易的基本认知框架，所谓的对华贸易让美国“吃亏”一说根本不成立。

特朗普作为关税政策工具的迷恋者，其提高关税税率的面面诉求，是抬高各国对美出口成本，迫使后者向美国让渡经济利益，弥补美国经济增长的缺口。但是，其计算贸易损益的方法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错误，违背经济学原理，这就导致其具体做法走向了盲目化、畸形化。

当今的产业链结构、跨国贸易结构早已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消费和供给的区域相对固化。中国及周边的制造业产品来说，其设计、生产主要集中在西欧、北美及亚洲的日本、韩国，原材料和能源供给地集中在若干原产地，消费主要集中在西欧和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全球制造业、资本加速梯度转移，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制造业迅速崛起，形成强烈的产业聚集效应。目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美国和西欧在高端产品的研发设计方面较有优势，同时保留部分高端制造业；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主导一般制造业，同时正在增加高端制造业的份额。美国和西欧大量进口一般制造业提供的商品，同时东亚和东南亚的消费市场也在加快升级和扩大规模。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制造业腾飞的同时，美欧资本也纷纷前来投资设厂，形成了美欧资本在东亚、东南亚地区本地化运营，本地资本和美欧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市场局面。

从全球经济增长周期发展规律来看，产业链和供应链是根据生产要素的成本比较优势及终端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在这一过程中，各国企业、各路资本在产业链、供应链的不同环节、不同时间点分享相应的产业增加值。相对来说，后进国家和地区在综合生产成本上具有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的资本和生产向这些地方转移，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还可以拓展新的消费市场，增强全球经济增长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总体上有助于增进全球各国的民生福祉。

不过，全球化资源配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由资本流动、生产线迁移带来的就业市场变化也需要重视。由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一般制造业向东亚、东南亚迁移，这些地区的普通劳动力需要替代性就业岗位。对此，就需要在政府层面采取必要的调控措施，拓展普通劳动力的就业方式和途径。比如，在医疗辅助服务、商业设施维护、绿化养护、社区管理、餐饮、短距离物流运输、艺术培训等一般服务领域，大量增加工作岗位。而试图将东亚、东南亚的大规模制造业回搬到西欧和美国并不现实，因为产业结构布局由劳动力和其他运营成本的比较优势共同决定，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人为强行推动产业大规模迁移，代价必然是高昂的。

事实上，目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基于各国资源条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形成的一个动态系统，各国的获益水平总体上也是平衡的，不存在哪个国家和地区“过度获益”的情况。还要特别强调的是，贸易是否平衡，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差额，因为除了工厂生产独立产品，当今的全球贸易，早已不是一家工厂“关起门来独生产”、可以任意定价的样貌了，而是发展出全球采购、全球配套、全球生产、全球销售的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衡量中美两国的贸易平衡情况，要看三个方面。

首先是货物贸易，这是最直观的一个角度。目前，美方盯着货物贸易逆差大做文章，看起来似乎是中国“多赚了美国的钱”。事实上，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货物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它们运用中国的低成本资源和成熟的配套能力，把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往美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同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这些产品销往美国，也实实在在地帮助美国降低了国内通胀水平。在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化的背景下，不管是一架飞机、一辆汽车，还是一部手机，其原材料采购、产品设计、零部件生产、整机组装等，都很难集中在一个国家完成。参与到产业链中的每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有权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产业增加值和商业利益。中国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获得的增加值，仅占商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当前贸易统计方法是以总值（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额）计算中国出口。如果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国对华逆差将大幅下降。

其次，在服务贸易方面。近年来，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形成了巨大“掘金”能力，对华服务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中国居民赴美旅游、就医、留学，为美国带来巨大收益，而且这种人员往来扩大了美国资本对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助推了其商业扩张能力。最近，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就撰文指出，美国是全球服务贸易中的赢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知识产权在华获利丰厚，这部分增加值可被严重低估，有必要展开调查和评估。

第三，是美资企业在中国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美方资本在中国设立工厂等商业分支机构，运用中国的低成本优势生产产品，然后在中国本地销售，这是美方获利的重要途径。2022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905.2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786.4亿美元的销售，差额高达4118.8亿美元。这一大笔差额，同样是美国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利益。

综上所述，近期，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完全是在扭曲公平贸易的基本认知框架，所谓的对华贸易让美国“吃亏”一说根本不成立。如此所谓的“中国制造”对美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试图抹杀中国产品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的重大福祉功能，不仅暴露了经济学上的无知，更折射了无底线“关税讹诈”的坏用心。这场闹剧，最终只会以一地鸡毛而告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学者看法

AI生成内容为什么要强制标识

■ 卢家银

在人工智能全面介入信息生产的背景下，未标识的AI内容不仅可能消解真实与虚构的边界，削弱公共讨论的理性基础，而且会导致责任主体的模糊，加剧法律追责与权利救济的困难。现行制度通过强制内容标识，在技术效率与风险防控之间建立平衡机制。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能够进行逻辑推理并生成高质量的文本、图像和视频，甚至能为人类提供很好的决策建议，为人类的生活与工作带来诸多便利。但是，与其相伴而生的还有虚假信息、错误信息、权益侵害等一系列显性与潜在的风险。它既会误导广大普通用户，也会严重污染信息生态和网络舆论场。为防范该颠覆性技术所导致的信息风险，推动AI健康发展，智能服务提供商者应当承担内容标识的义务。这既是社会各界的期望所在，也是许多国家在技术发展与公共利益之间所作的价值权衡。

义务论：内容标识源于对特定危险的防范

在义务论层面，智能服务提供商者负有内容标识的义务，源于对特定危险的控制与防范。智能服务提供商者作为技术开发与部署的核心主体，其算法设计和数据训练直接决定了生成内容的性质与潜在社会影响。根据危险控制论，作为危险的开创者和控制者，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采取必要措施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现代网络空间，智能服务提供商者通过向广大用户提供大语言模型的交互服务，让互联网与智能算法实现了深度融合，开启了一种全新的信息服务与交流互动。借由该类服务与实践互动，智能服务提供商者和相关平台的运营者可以从该活动中获利。作为这种特定、抽象危险的开启者，智能服务提供商者在提供相关服务的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广大用户的相关权益免受侵害。

同时，智能服务提供商者作为智能系统的实际控制者，通过数据训练、模型优化、参数设置等环节深度介入内容生成过程，实质上掌握着技术权力的“阀门”，发挥着现代社会信息生产和筛选的“把关人”角色。它直接决定着向用户提供怎样的信息，并影响着用户的信息接收、思考与决策方式。相较普通用户，智能服务提供商者拥有强大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能够预见可能发生的危险和损害，有能力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减轻损害。《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要求AI服务提供商者对生成内容添加标识，本质上是将技术风险转化为可追溯的法律责任，重点解决“哪



人工智能机械手拿着地球仪。

视觉中国供图

些是生成的”“谁生成的”以及“从哪里生成的”的问题。这种设定将技术黑箱转化为可追溯的责任链条，不仅是对个体侵权行为的预防，更是对技术异化风险的系统性遏制，体现了用户权力与责任相匹配的正义原则。

功利论：内容标识能够促进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在现代社会，人类并不缺乏规制技术发展的手段，缺少的是能够促进社会福祉的治理手段。

换言之，在规制技术的同时，需要做到既不影响技术的创新发展，又不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合法权益。对AI进行治理，要求其履行内容标识义务，目的即是为了实现社会福祉的最大化。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还可能对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应当平衡该利益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既应维护公共利益，又需保护个人权益，对技术所施加的限制尽可能地保持在最低限度，以不妨害个体最大限度地追求幸福。

在人工智能全面介入信息生产的背景下，未

面向青年讲好党史“四个故事”

■ 马龙锋

青年群体求知欲强、思维活跃，面对当代社会便捷多样的信息渠道，多元多变的思想观念，会不断增强他们对错误信息的鉴别能力和抵御能力。中国共产党有着一个多世纪的接续奋斗和实践创造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光辉业绩，积淀形成了许多具有标识性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我们今天面向青年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宝贵资源。

讲好中国共产党为民爱民的奋斗故事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好。新中国和好日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有名可查的共产党员多达37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从西方反华势力的围堵打压，到各类自然灾害、突发事件，是共产党员作为“排头兵”，用一次次挺身而出、牺牲在前，换来了国泰民安。中国共产党来到世间，就是要完成近代以来其他政治力量都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讲清楚党和人民的鱼水情。从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写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我们的战士把仅有的一床棉被剪下一半留给群众，从解放军初入上海“不住民房睡马路”，到新中国成立多年后政府仍如数兑现战争年代的借条、公债券。可

见，党对人民的爱是无私的爱。“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民心；为了“两弹一星”基地建设需要，青海金银滩草原的1700多户牧民在三天之内无偿让出祖祖辈辈居之之地，这是和平建设时期的民心。可见，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是最由衷的拥护。

讲好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的青春故事

讲清楚党的青春风华源于崇高理想追求。正是有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崇高追求，共产党人的心中永远燃烧着激情之火，于是才有了夏明翰被捕后“砍头不要紧”的英勇无畏，才有了瞿秋白就义前“此地甚好”的淡定从容，才有了57岁的徐特立面对漫漫长征路依然精神抖擞阔步前行。我们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不是封闭僵化的教条式信仰，而是与时俱进，在不断总结历史之问、回答时代之问、直面未来之问中持续创新理论、开拓实践。

讲清楚党的青春风华源于“赶考”自我清醒。大革命失败后及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文革”结束后果断粉碎“四人帮”、破除“两个凡是”，党一次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病症。通过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从百年前南

湖上的一叶红船到如今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成为充满朝气和锐气的“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讲好中国共产党兴文育人的学理故事

讲清楚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正确发展方向。党创立前夜的中国文化，正在古与今、东和西的双重困境中进退失据，面临着深重危机。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认为中国文化“百事不如人”，干脆通通放弃、全盘西化，其论甚嚣尘上之际，连汉字的存在都开始变得岌岌可危。以梁漱溟、张君勱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则主张“惟古是尚”，试图不加批判地恢复儒家的旧伦理精神传统，其极端人物辜鸿铭更是留辫子、穿旧服，屡屡为纳妾和缠足进行辩护。我们党既不自安自卑，也不抱残守缺，坚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推动建设民族的科学的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到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真正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百年的文化激荡中再铸了国魂。

讲清楚是中国共产党让中国文化重新找回了自信。启蒙运动以降，西方文化及其话语体系逐步确立了在全球的统治地位，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

讲好中国共产党和平进步的大爱故事

讲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和平的党、亲和的党。中国共产党不以所谓“文明冲突”定义局部冲突进而视人类社会为意识形态战场，更不主动输出革命，面对艰难外部环境时，向来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创造性地采用了和平赎买的办法。改造完成后，又明确提出留保留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正因为我们是和平的、亲和的，才使得“近者悦、远者来”，有了战争年代斯诺、白求恩等的万里来华、友华援华，有了新时代G20峰会、“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

讲清楚中国致力于为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早在195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上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准则。进入新时代，随着大变局下全球格局深度调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更加举足轻重。面对国际态势，中国共产党秉承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天下一观、外交观，一如既往主张求同存异、合作应对，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指出了摆脱零和“多输”、走向和平共赢的新方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党委书记)